

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书写时代新篇章

构筑时代文艺高峰的思想指针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白 烛

正当全国文艺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指引,隆重召开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地要点阐发,语重心长地殷切期望,对于文艺界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文艺事业、构筑文艺高峰提出了新的目标,对于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作品、力求德艺双馨提出了新的希望,给广大文艺工作者争取社会主义文艺的持续繁荣与更大发展,指明了方向,厘清了思路,提供了动能,激发了信心。

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年多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就文艺工作发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这既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事业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事业与文艺工作蒸蒸日上的热切期待。这种重视与期待,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显得更为具体。这都使得我们当下面临各种挑战的文艺工作,如同大海行舟,行有导航仪表,进有导向指针。

两个“重要”的高度估价

文艺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是党在不同时期都极其重视、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根据当时国内国际的总体形势,联系抗战背景下革命事业的现实需要,充分地肯定和评价了文艺的地位与作用。他把“文化的军队”看成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由此,他把文艺看作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艺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时隔70多年的今天,社会历史的演进,文艺自身的进取都使现今的文艺与当年的文艺,面临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处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文艺的地位与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昌盛”时,就着重论述了当今时代文艺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他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升华的大视野、大角度,谈到文艺作为精神结晶和文明符号的意义,又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顺理成章地得出“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的结论。取精用弘的论述,高屋建瓴的见解,形象而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文艺工作意义的深刻认识与高度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党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时,特别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在对文艺事业作了这样两个“重要”的高度肯定和充分估价之后,又进而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弘扬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种以高度精练的语言对文艺工作的作用与贡献的高度概括,反过来又以昭如日星的事实证明两个“重要”的言之有据,广大文艺工作者“有智慧有才情,敢担当敢创新,可信赖可依靠”的毋庸置疑。这种相互印证精湛论说,既对两个“重要”的论断给予了有力的深化,又给文艺工作者一如既往地做好文艺工作以莫大的激励。

文艺的地位要在完成历史任务中进而彰显,文艺的作用要在履行时代使命中加以落实。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说起,既高屋建瓴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又豪情满怀地期望文艺工作者“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这些重要论述,既站高望远又钩玄提要,从文艺与民族精神的走向、与时代进步风向的密切缘结,说到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繁荣昌盛与文艺的繁荣发展的内在关联,既逐步深入地论述了民族、文化与文艺彼此映照、相互依存的密切关联与递进关系,又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把民族复兴的伟业落实到文艺工作上。这既是对文艺事业地位与意义的高度认定,也是对文艺工作者工作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待。它昭示人们和文艺工作者,需要从民族复兴的大局、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进步的趋势的高度来认识文艺的作用与职能,也需要从这样的大局、趋势与高度来认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从而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肩负起这个时代文艺家的重要历史责任,履行好这个时代文艺家应有的神圣职责。

三个要点的充分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就当下文艺工作面临的现状,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着力的方面,都有全面的论说与精当的阐述。细读这个讲话,还会发现在众多的要点阐发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论述较为集中,话题更为彰显,这就是文艺与时代、创作与现实、作家与人民。因此,时代、现实、人民,可以说构成了文艺工作的三个基本要素与内在要点。

多角度和多方面地强调和论述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俯拾皆是、随处可见。这里既有从大的方面着眼的“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的不易之论,又有从文艺的具体发展得出的文艺“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至理名言。有了这些丰盈而精湛的论述作铺垫,“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的论断,就至当不易,难以移易。把反映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作为文艺的使命,并提升到神圣的位置,可以说既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事实上,处于一定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既不一定就是时代生活的随行者,也不一定就是时代精神的歌吟者。君不见,所谓表现“自我”的写作屡见不鲜,所谓疏离时代的写作也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写作,只以游戏为旨归,以娱乐为目的,时代生活在他们这里或被变形的审美所遮蔽,或被“二次元”的作品所替代。在文艺如何面对时代、如何处理生活这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地反省,也确实需要真正的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文艺创作上,“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就成为文艺工作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整的现实问题。

关于文艺与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除了一再强调文艺要“积极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还特别提请文艺家们注意:“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显而易见,近40的巨大变革,既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也是这一代文艺家最该写作的题材和最能反映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艺术,总的来说,是与时代同频、与现实同行的。但仔细检视起来,真正以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和由此引发的人民精神巨变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力作,数量既不很多,质量也明显不高。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的,确实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专列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议题,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关键是热爱人民”三重角度,详尽论述了如何使“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基本导向和真正落到实处。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扎根人民”、“贴近人民”的同时,还从“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喜怒哀乐”以及以弘扬正能量的作品“引导人民”、“激励人民”、“服务人民”等诸多方面,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无处不在的广泛关联,阐发了文艺与人民深刻关联的多种可能。

如果“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大的目标和总的要求的话,那么,“观照人民生活”、“追随人民脚步”、“面向群众创作”、“鼓舞人们”、“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等几个方面的要求,由上到下,从内到外,涉及到情怀与立场,状态与面向等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些具体而微的要求与期望因为秉承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兼顾的原则,使得人们看取文艺的眼光自然向下,文艺工作的重心必然下移,这就使得“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文艺工作的一个纵贯始终的系统工程,保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原则,成为始终不渝的创作导向,构成文艺工作的基本常态。

四点“希望”的发展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这里的“希望”,凝结了党的领导人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热切期待与诚挚厚望,实际上也是针对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状,为着开创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崭新局面,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从精神姿态、创作导向、文艺手段、理想持守等几个方面,所给予的顶层设计,所谋划的切实策略。四点“希望”,各有独到内涵,彼此环环相扣,它们的内在关联与积极互动,构成了搞好文艺创作和做好文艺工作的四大要点。

“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从确立信念、提振信心的层面,呼唤文艺工作者建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焕发出全新的精神面貌。



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自身具有怎样的魂魄,对于文艺工作者的为艺和为人都至关重要。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这里既有如何识古和继往,又有如何知今与开来,对文化自信的应有内涵作了简要的概述。不同于人们一般多在自我与个人的角度上去理解与认知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文化自信超越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所在,那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因此,文化自信从小处说关乎到文艺创作,从大处说关系到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坚定地拥有文化自信,坚韧地持守文化自信就是文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再度重申和生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的引述式论证,在“为了人民”的总目标下,既强调文艺创作要“歌颂人民”,又强调文艺工作要“服务人民”,在文艺的各个方面都强调人民的立场、人民的角度、人民的坐标,人民的元素,从而把“人民”具体而微地落实到文艺创作、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阅读的各个环节,使文艺创作“扎根人民”,使文艺家“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在这里,人民与时代和生活一起,构成创作之源、作品之本、作家之根、文艺之依,既为文艺创作所不可或缺,又使得“艺术之树”常绿长青。

“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旨在以创新手段促动优秀文艺作品的产生,推动文艺创作的新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切近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提醒文艺工作者,“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文艺创作全过程”,又强调文艺家在文艺创作中,要努力做到“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因此,他又告诫文艺工作者,“我国文艺不仅要有体量的增长,更要创造质量的标杆。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要克服浮躁这个顽疾,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这些论述都清楚而分明地告诉人们,创新既要锲而不舍又要秉要执本。

“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主要从艺术家的理想和艺术作品的内涵两个方面强调有为的文艺工作者的自我塑造与积极的文艺作品的正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一语破的指出:“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而拥有这样的“伟大的灵魂”,就需要文艺家自身“养德”与“修艺”并重,“崇德”与“尚艺”兼顾,使自己做到德艺双馨,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文质兼美。在这一部分的问题论说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文艺家的“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的同时,还一再希望文艺家们“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可以说,这些希望中有提醒,引领中有劝诫,其情切切、其言谆谆,令人振奋,也引人警醒。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深入浅出的理论性、求真务实的操作性直面文艺的新实际,读解文艺的新课题,钩玄提要地阐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与新希望,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推动创作繁荣和构筑文艺高峰的新思路与新策略,使它成为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党关于文艺工作的又一重要文献。相信这两个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的贯彻与落实必将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前进的路向,振奋创新的精神,使新世纪的文艺工作获得更大的动力,焕发新的活力,从而构筑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高峰,谱写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的光辉篇章。

“文化自信”这一理念,贯穿了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忘本来、中国立场、中国理论、中国智慧,老庄孔孟是中国的王牌,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些不时闪现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言辞与含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话语资源。但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借军事、经济的强大而为我们躲闪不及的存在,久而久之使我们养成了眺望他者世界的习惯,而对自己的伟大历史和巨大思想遗产往往采取背对的姿态,甚至以为这些资源已成明日黄花再难转化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资源。其实,无论是在政治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还是美学、文学等方面,中国文化都有可以转化为当下话语资源的潜力与可能,并且这些话语资源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那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方略都有可能是医治现代人类社会之痼疾的良方。

文化自信的不足,话语权意识的淡漠导致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性的弱化。

大约在上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还包括其他许多人文科学)就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我们用来进行言说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于国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几乎变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十多年前,我曾在北大课堂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贫乏化问题”的看法。记得我当时深陷困惑,忧心忡忡。之后,我又将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国内外访问学者们召集在一起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匮乏,几乎全靠外来接济,这个问题当然重大。就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而言,我们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贫油”大国。

那么,是否还可能有被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利用的属于我们民族自己创造的理论资源?

这一发问,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我们原有的精神仓库,是否还能提供一些可以被当代文学批评利用的理论资源;二,我们是否还有能力于当下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代文学批评利用。

前者是指先人们创造的思想。中国先人们曾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思想,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殿堂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与西方思想家们交相辉映,曾展示了他们创造思想时的那种巨大冲动、充满精神快感的画面与傲然人间的翩翩风度。这是全世界的高度感知和共识。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了近代,仿佛突然中了魔法,中国的思想家们再也不能与他们的西方同仁并驾齐驱,各擅所长。我们经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思想贫困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再也不能一如既往地向人类落大方地奉献他们独特的有利于人类心智开化的创见。

那么,中国的古代先人们创造的思想,到底还有没有作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的可能性?

在未经过审慎而理性的分析之前,在未经细心而周到的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仅仅是随着感觉之流匆匆而下。我们不自觉地从内心深处觉得先人们的思想已经陈腐老化,已经过时,已不再具备解读今日之文学的能力;它们已成卷刃之老刀,再也无法“解牛”之能事。我们在这种泛泛的感觉之中,忘记了对一个问题的严厉追问:究竟是般意义上的所有人类的古代思想都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而于当下无补呢,还是仅仅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而于当下无补?我们并未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到对前者的否定。那么为什么单单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具有时效

性?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几次理直气壮地反问过,为什么独独是我们的文化过时了?事实上,我们是在对中国古代思想不假思索、不加甄别的态度下去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理论资源的。我们没有足够强烈的起用中国古代理论资源去试一试的动机。我们没有严肃而认真地设想过:倘若我们一路深入中国古代文化的腹地,利用一下古代的理论资源,会不会也能展开别致的、充满灵性的、不亚于利用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的理论资源的美妙言说呢?既然说中国古代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在逻辑上绝不能成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大胆假设:老庄的无处不在的“道”,来自于中国美学“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精妙思想,《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以及似乎无穷无尽的其他古代经典,在经过我们心灵的重新过滤与生发,在经过新的、非常别致的处理之后而得以重新表述,是否都有可能成为意想不到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在论及文学的高下时,历来讲“意境”、“雅趣”、“雅兴”、“味道”、“意趣”等,而并无“深刻”这一范畴,可谁证明过“意境”等范畴比“深刻”这一范畴来得低下呢?西方文学所依仗的“深刻”,我们也许能够做到,但我们的“意境”西方人也一定能够做到吗?我们的文学批评为什么不从中国古代文论中进行话语资源的开发、去吸纳精粹而独到的见解并将其变为我们所认可的标准呢?

“文学创作已进入了现代形态,而对其加以批评,就自然必须要凭借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这个提法更像是一个圈套。因为我们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另一点:不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古代思想,自然也就不能作为面对现代形态之文学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我不喜欢“自然”这个字眼儿。从理论上说,文学创作已进入现代形态,那么只有那些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才可作为批评的资源,似乎是成立的,但却不符合事实。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创作并非都一律进入了现代形态;文学的现代性与时代的现代性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也未必只有所谓现代性,“现代”与“现代性”并不是同一的概念。现代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倒常常显示出与“现代性”的不和、背离与对立。就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而言,这个时代同样甚至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欢迎古典的文学艺术形态。退一步讲,即使属于现代形态的那一部分文学,对其进行研究,是否就必须依赖于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对现代形态文学的解读就得使用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资源”,这个看法显然是可疑的,是一个逻辑上的把戏。其实,不管是何种理论资源,都不过是向我们提供一种读法而已。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未必就一定要凭借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资源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真的像当年有人判断中国贫油那样而理论贫困?我们到底还有无通过李四光式的执著探寻而摆脱理论话语资源贫困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之后,不仅为自己创造足够开销的理论资源而且输出疆界供他人使用?理论资源的输出象征着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意味着一个民族有着可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表现着一个民族应有的不愿寄生、享受他者而愿与世界一道共创天下、平分秋色的气度。当年,庄子并不是面对他人的资源,而是面对造物主的天地人间,在穹隆之下进行了旷达无极的思考,为人类创造了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始终提醒着我们要对文化自信的丧失有所警觉,从确立文化自信、掌握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地位和生存价值的高度,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了充分阐释与论证。

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使中国在过去丧失了许多次与国际先进潮流对话、融会的机会,并使这个文明古国一度急剧衰败,这一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改革开放的中国,早已对“开放”一词的含义有了透彻的理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讲话》辩证地完成了时代与历史、民族与人类、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表述,自始至终,既坚定地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又理路清晰地将民族国家放置于全人类范畴考量、定位,用开阔的世界性目光打量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出自《炼金术士》,作者是一个巴西人。作品写一个西班牙牧羊少年在西班牙原野上做了两个内容相同的梦,梦中的情景是:在很遥远的地方,一座金字塔下埋藏着一批财宝。这个异想天开的牧羊少年,决定追随天意,以梦为马,去遨游人生。他历尽千辛万苦,越过海洋,穿过沙漠,来到非洲,终于找到了那座金字塔。然而,他根本没有发现财宝。此时来了两个坏蛋,将他捉住了一顿,当两个坏蛋准备丢下他离去时,其中一个对他说:“你会活着的,因为我想让你永远知道,你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两年前,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也做了两次内容相同的梦。我梦到,我应该到西班牙的原野上去,寻找一处破败的教堂。在圣器室的位置上生长着一棵桑树。我被告知,如果我在桑树的根部挖下去,我将挖到一批密藏的财宝。但是,我不至于蠢到为了一个做过两次的梦,而穿越整个沙漠。”那个人所说的地方,正是牧羊少年出发的地方,牧羊少年听罢,双膝跪下,仰望苍天,热泪盈眶。他重返他的西班牙草原,在他出发的地方,发现了一堆财宝。这是一个寓言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

□曹文轩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